

思與言 第42卷第4期

2004年12月 頁41-81

41

蔣廷黻、羅家倫、郭廷以： 建立「科學的中國近代史」及其詮釋*

林志宏**

蔣廷黻、羅家倫、郭廷以： 建立「科學的中國近代史」及其詮釋*

林志宏**

本文以「中國近代史」研究為中心，分析這一領域如何在歷史學科中被建立起來，並進而發展為怎樣的特色。主要的焦點集中在蔣廷黻、羅家倫及郭廷以等三人，說明他們對中國近代史的影響。文章側重三個重心重新檢視：第一，「中國近代史」如何成為獨立研究領域，包括時代的背景和條件。第二部分討論研究近代史的方法及意義，針對1930年代羅家倫、蔣廷黻和郭廷以三人相關的言論為主。最後則以1940年代的郭廷以的著作《中國通史》稿本為例，分析其中有關近代史範圍的內容，並嘗試檢驗稿本中所反映的近代史觀及詮釋。

關鍵詞：蔣廷黻、羅家倫、郭廷以中國近代史

* 本文最初在「史學・時代・世變：郭廷以與中國近代史研究」學術研討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2004年1月12-13日）宣讀。文章能夠順利完成，得到近代史研究所陳永發所長及檔案館莊樹華主任允准，引用「郭廷以檔案」裡《中國通史》稿本資料。另外，會議對話人沈松儒教授及兩位審查人提供寶貴意見，謹此一併特致謝忱。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

一、前 言

史學在近代中國發展，至少歷經三重思想變化。這三次內容的主要焦點，分別集中在「什麼是歷史」（如梁啟超〔1873-1929〕的〈新史學〉）、「如何研究歷史」（如胡適〔1891-1962〕等整理國故運動）和「怎樣解釋歷史」（如馬克思史學）上。而其中最飽受爭議和引起分歧的，便是關於「怎樣解釋歷史」一部份。總結來說，近代中國對於「歷史解釋」（historical explanation）的討論，非但維持了相當長的時間，並且參與創作的人數衆多，可說前所未有的，絕非僅是懂得書寫的知識分子而已。⁽¹⁾晚清自章太炎（1869-1936）、梁啟超以來，便以不同的排滿、革命等史觀，來解釋中國歷史發展。無論是1920年代末期以降開展的中國社會史論戰，乃至中共對歷史五階段的討論，「史觀學派」因為和政治的關係密切，在近代中國史學界始終佔據極為重要的一席之地。

此處所要探討的是有關「怎樣解釋歷史」中的一項環節。我將以「中國近代史」研究為中心，分析這一領域如何在歷史學科（discipline）中被建立起來，並進而發展為怎樣的特色。同時，本文將集中在羅家倫（1897-1969）、蔣廷黻（1896-1965）及郭廷以（1904-1975）等三人關係上，說明他們對中國近代史的影響。與以往傳統史學不同，「近代史」做為一門歷史全新的研究領域，是二十世紀的時空環境因素下

⁽¹⁾ 近年來，學界有以歷史書寫和國族建構為題，做為雙重面向來討論，如：沈松儒，〈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28期（1997年12月），頁1-77。

所誕生的產物。這一新的研究典範，不但有著現實需求，也蘊含歷史解釋在近代中國所呈現的意義。

關於中國近代史的研究，許多學者都曾不約而同指出羅家倫、蔣廷黻及郭廷以三人的貢獻和關係。以往著重的面向多半以個人的史學成就來看，⁽²⁾或是自學術交流、研究人才培育的過程上來探討。⁽³⁾本文則想側重在三個重心重新檢視：第一，「中國近代史」如何成為獨立研究領域，包括時代的背景和條件。第二部分討論，將涉及研究近代史的方法及意義，主要乃針對1930年代羅家倫、蔣廷黻和郭廷以三人相關的言論為主。最後則以1940年代的郭廷以的著作《中國通史》稿本為例，分析其中有關近代史範圍的內容，並嘗試檢驗稿本中所反映的近代史觀及詮釋。

⁽²⁾ 例如：蔣永敬，〈羅家倫先生的生平及其對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貢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期（1974年12月），頁461-495；張慧中，〈蔣廷黻對中國近代史之研究及其貢獻〉（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0）；侯勵英，〈郭廷以(1904-1975)及其史學研究〉（香港：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1998）；林文仁，〈介於兩個世界之間－蔣廷黻和他的中國外交史研究〉，《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第31期（1999年6月），頁117-160；王爾敏，〈漫談郭廷以先生與中國近代史之學術建樹〉，《漢學研究通訊》，第22卷第3期（2003年8月），頁35-44。

⁽³⁾ 張朋園，〈郭廷以、費正清、韋慕庭：臺灣與美國學術交流個案初探〉（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

二、擺脫「帝王家譜」與 「殖民侵華」的歷史書寫

1930年代「中國近代史」之所以能邁向獨立的研究領域，主要建立在三個基石之上。本節將先談前面兩項。首先，它是來自清季「史學革命」對歷史概念發展下的新認識。就時間點的劃分來看，中國近代史涵蓋的範疇，跨越了清代和民初時期，與向來以朝代做為書寫歷史的分期方式有所不同。但從內容而言，近代史絕大部分又隸屬於清史研究的範圍，所以，兩者間不無重疊。因此，要將晚清歷史的發展歸納成「近代」（modern），就需賦予其中意義。有關這樣思想上變化，我們應從清季「史學革命」的基礎來瞭解。

衆所周知，晚清以降中國遭遇一連串西方衝擊，許多人開始意識到自己所處時代係「三千年來未有之變局」。士大夫在努力尋求國家富強之道上，歷史經常成為他們汲取的思想資源。直到二十世紀初，知識分子一方面憂忡國家的興衰存亡，另一方面受到西方史學理論及方法所影響，進而提出「史學革命」的口號，希望擺脫傳統史學的桎梏。⁽⁴⁾然而我們應該注意：對擁有大量歷史文獻、並且已具久遠編纂傳統的中國史學而言，清季發生史學革命，似乎相當令人難以理解。不過，誠如杜贊奇（Prasenjit Duara）所言，這一套藉由新的詞彙和敘事，表達過去及現在之間關係，目的就是希望重新確立及建構「國族」

⁽⁴⁾ 梁啟超的〈新史學〉是最常為人們所援引的例證，相關的討論文章、專書極多，最近一篇為：黃克武，〈梁啟超與中國現代史學之追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1期（2003年9月），頁181-213。

的地位。⁽⁵⁾清季「史學革命」帶來的影響，不僅既對「歷史」本身意涵，有著深遠的衝擊，甚至還改變了對歷史敘事的面貌。

如此強調和提倡的「新史學」革命，最顯明實例就是不再以王朝做為書寫歷史的分期及標準。內藤湖南（1866-1934）著名東洋史分期的《支那論》，就是一種新的歷史書寫方式的代表。⁽⁶⁾我們也可以這麼說，將中國史嘗試分期，非惟提供另一套歷史敘事的方式，說明不再只以帝王世系家譜為主要內容，而且也希望進而凸顯其中「動態」的樣貌。更值得注意是，此一影響後來廣泛波及至教科書的寫作上。如汪榮寶（1878-1933）在北京譯學館編寫的《清史講義》，⁽⁷⁾其中便呈現出新舊史學著作內容和書寫雜揉的情況。就書寫形式而言，該書改用章節體，擺脫傳統史學的體例；可是內容上則模仿了東洋的歷史著作及其敘事結構。《清史講義》參考日人桑原鷺藏（1871-1931）《東

⁽⁵⁾ Prasenjit Duara,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p. 5.

⁽⁶⁾ 內藤湖南，〈支那論〉（東京：創元社，1939）；相關討論見：Joshua A. Fogel, *Politics and Sinology: The Case of Naitō Konan, 1866-1934* (Cambridge, Mas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168-182.

⁽⁷⁾ 汪氏所寫的本朝史原先完成於1909年（見：汪榮寶，《汪榮寶日記》〔臺北：文海出版社重印本，1991〕，宣統元年四月六日條，頁123），但是卻因各種緣故而在民國建立後出版，更名為《清史講義》。根據汪榮寶的後人所追記，汪氏初因目擊清季國勢頽廢，所以在原來講稿中頗有痛陳時弊，語多觸涉忌諱。此書本來打算在宣統年間整理出版，並將有忌諱之處先行刪消，但結果仍遭清廷禁其書。見：汪榮寶，《清史講義》（汪公紀自刊本），「重印前記」，頁1-2。

洋史提要》寫法，起自滿州開國前歷史，終至太平軍弭定為止，把清朝創業以來三百年歷史歸為「近世史」。⁽⁸⁾當然，想要呈現「近代」意涵的過程，絕非一蹴可幾，直到民國以後仍舊爭議不斷，像《清史稿》的編纂即為其例。

民國肇建，各方政治勢力都積極在爭取歷史的發言權。如何來編寫一部全新的歷史著作，毋寧也攸關著政權本身的合法性問題。其中尤須注意的是怎麼來看待清史的地位？它又該怎麼與新的史學體裁來配合？這兩項問題均涉及民初政治的現實環境。最受輿論所矚目就是有關北京《清史稿》的編纂。《清史稿》係於1914年由趙爾巽（1844-1927）發起，歷時十數年始刻竣。該書以中國正史的體例來編修，無疑秉持傳統所謂「正統」史書的宗旨，由後代來纂修前代的歷史為意趣。必須指出，參與《清史稿》纂修的人士，多為清室遺臣，故史稿在出版之初，無論宗旨、立場都備受質疑。⁽⁹⁾柳詒徵（1879-1956）曾在1928年給朱師轍（1879-1969）的信函裡，提到中國史法不外乎「明君臣之義」、「嚴夷夏之防」二端，而批評《清史稿》「雖有體例，尚無宗旨」，⁽¹⁰⁾便是其中代表的看法。

⁽⁸⁾ 汪榮寶，〈清史講義〉，頁2。

⁽⁹⁾ 前田司，〈『清史稿』小考〉，早稻田大學文學部東洋史研究室編，《中國正史の基礎的研究》（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部，昭和59[1984]年），頁413-431；馮爾康，《清史史料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3），頁58-65。相關文獻均收在：許師慎等輯，《有關清史稿編印經過及各方意見彙編》（臺北：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1979），共有三編。

⁽¹⁰⁾ 柳詒徵著，柳定生、柳曾符編，《柳詒徵劬堂題跋》（臺北：華正書局，1996），〈答朱紹濱書〉，頁284。

但《清史稿》最大的問題不惟宗旨而已，更重要在資料的取得。質言之，愈接近現今的資料愈難獲致，而當中的變化與意義也愈無法掌握。對明清筆記一向極為熟稔的謝國楨（1901-1982），在1935年談到《清史稿》問題時，便曾指出該書其實有著史料方面的侷限。謝氏認為，對鴉片戰爭及太平天國史事的研究，《清史稿》明顯地在史料上尤感缺乏。他建議若想要廣泛地蒐羅遺聞軼事，則非徵諸舊家私藏或訪求海外圖書不可。⁽¹¹⁾透過謝氏這段話我們可以想見：摒除纂修的立場、宗旨不談，到了1930年代時，史學界普遍對《清史稿》的內容及觀點，依舊無法感到滿足。尤其關於近代中國歷史的範圍，史料貧乏難於窺得全貌。幾乎同一時期，錢穆（1895-1990）又提供了另一訊息，說明固有的史學著作體裁，面臨不得不變的命運。錢曾在某次私下的場合，向章太炎詢問此後新國史應如何撰寫，並謂體裁方面該有何改變？錢氏會有如此衡慮，不啻個人學術生命之所寄，也適足說明當時環境背景的影響。而根據錢氏日後回憶，章太炎指出外交、食貨與刑法等，無論所需的內容範疇乃至專門知識，均遠非原來舊體例可限。⁽¹²⁾從章、錢兩人談話很清楚顯見：近代中國的各項變遷，已使得傳統歷史書寫體例必須跟著改變，以因應時代需求。換句話說，民初《清史稿》剛完成時，許多人曾從學術角度，意識到此部書所殘缺之處。而這些期望背後同時也反映出：亟待以全新的角度來解釋近代中國發展，嚮往此類歷史著作出現的心態。

⁽¹¹⁾ 謝國楨，〈明清筆記談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明清史料研究〉，頁146-147。

⁽¹²⁾ 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2），頁159-160。

中國近代史地位成立的第二重因素，和二十世紀上半葉歐美學界研究的風氣有關，特別是討論帝國主義和殖民地關係之熱潮。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西方社會普遍掀起一股悲觀的思潮，懷疑帝國和軍事主義過度擴張的合法性；而1920年代美國總統威爾遜（Thomas W. Willson, 1856-1924）提出民族自決主張，使得殖民地和母國間地位，曾引發諸多討論。許多亞、非洲的殖民地人民，也跟著開啓了類似反現代化帝國主義的論調，⁽¹³⁾出現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謂的「殖民地民族主義」（colonial nationalism）情緒。更重要是，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透過印尼的經驗告訴我們：那些通曉殖民地語言和帝國語言的雙語被殖民菁英，正是潛在的殖民地民族主義者。⁽¹⁴⁾反觀中國近代史的研究，也可以從如此的脈絡中來理解。最先致力於中國近代歷史研究發展的蔣廷黻、羅家倫等人，無疑都受這方面西方相關言論的影響。

讓我們先以蔣廷黻個人的留學經驗為例。蔣氏是在1919年夏天，進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學習政治學的。按照蔣自己晚年供證，那時最令他感到興致、雀躍的課程之一，是沙費爾德（William R. Shepherd）講授的「歐洲發展史」。這門課程內容，主要以歐洲本位的態度來看待國際關係，可是蔣廷黻卻對如此觀點發展出來的倫理價值，深感困惑。他回憶上課情形，說：

⁽¹³⁾ 艾愷（Guy S. Alitto），《文化守成主義論－反現代化思潮的剖析》（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公司，1986），頁112-250。

⁽¹⁴⁾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91), p. 114.

就我記憶所及，沙費爾德教授從未用過「帝國主義」一詞。對於歐洲人的擴展，他的倫理觀念如何？我不得而知。但他卻不停的討論此一問題。他對世界性、持續性的發展本身就極有興趣。因為沙費爾德教授從來沒有討論帝國主義問題，所以他的課自然而然引起我對此一問題的好奇心。因為中國是歐洲帝國主義者的犧牲品，所以，在不問歐洲對外發展究竟對歐洲以外地區是福是禍之前，我是不能聽他的課和讀他所介紹的書籍的。我也不能不問是否能有較好的方法來解決此一問題。⁽¹⁵⁾

這番話確實反映了當時西方學界對殖民研究的關注與熱絡，也強調所謂「世界性」、「持續性」等主流觀點，說明西人對歐洲擴張合理化的詮釋。可是對歷經百年西方列強壓迫的中國人而言，顯然有著難以言喻的傷痛。儘管蔣廷黻一再申明：自己並沒有因此對歐洲帝國主義的殖民活動而深感仇恨，不過他卻也希望從外交途徑來尋求中外平等和互惠關係。⁽¹⁶⁾

蔣廷黻對於外交看法的深化，不但有著時代和環境背景的影響所致，後來還獲得羅家倫的支持。1921年，適逢九國會議在華盛頓揭幕，蔣、羅兩人曾經聯合其他留美學生，共同參與維護國家主權的活動。⁽¹⁷⁾緊接著1922年的秋天，羅家倫也進入哥大研究院就讀。在這段期間，

⁽¹⁵⁾ 蔣廷黻英文口述，謝鍾璉譯，《蔣廷黻回憶錄》（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頁77。

⁽¹⁶⁾ 蔣廷黻英文口述，謝鍾璉譯，《蔣廷黻回憶錄》，頁78。

⁽¹⁷⁾ 羅家倫，〈壇坫風淒—憑弔蔣廷黻先生〉，收在《羅家倫先生文存》（臺北：國史館，1976），第10冊「記傳」，頁191-193。

蔣氏受到指導教授海斯（Carlton J. H. Hayes）啓示，刻正著手進行有關1880年以後英國勞工黨及帝國主義反應的博士論文。⁽¹⁸⁾選擇博士論文題目對蔣廷黻來說，其實有其深意的。雖然蔣廷黻對國際關係、外交政策等諸項問題，大致皆了然於胸，可是這些問題關懷的出發點，除了受到時代「意見氣候」（climate of opinion）所影響有關，政治活動的參與開啓學術研究的熱忱外，更有可能是與來自對中國內部本身問題的體驗。最直接的證據就是蔣氏在撰寫博士論文時，經常和羅家倫私下論及有關中國史學及研究方法，甚至曾經向羅借閱過《日知錄》、《明夷待訪錄》或《廿二史札記》一類史籍。⁽¹⁹⁾兩人那時所談的內容究竟為何，今已難於稽考；不過，對進行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工作，雙方似乎早已形成共識。蔣廷黻晚年跟郭廷以說「最早賞識我，勸我做中國近代史研究工作的人是羅志希」，⁽²⁰⁾應係實際情況，並非虛言。

同樣受到蔣廷黻激勵之下，羅家倫也開始注意到近代中國史料。本來羅氏出國留學，目的是為了學習西方歷史哲學，希望有朝一日歸國後，能夠導正國內唯物史觀研究風氣的偏執。然而哥大求學期間，相繼發生的外交事件及困境，也讓「五四」青年羅家倫開始思考中國國際地位和未來。我們可自1925年5月間，羅氏致張維楨（？-1997）、張元濟（1867-1959）的兩封信函中獲得證實。當時在倫敦的羅家倫，給張女士情書裡提到：

⁽¹⁸⁾ 蔣廷黻英文口述，謝鍾璉譯，《蔣廷黻回憶錄》，頁78-79；陳之邁，《蔣廷黻的志事與平生》（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5），頁16-17。

⁽¹⁹⁾ 羅家倫，〈壇坫風淒—憑弔蔣廷黻先生〉，頁193。

⁽²⁰⁾ 羅家倫，〈壇坫風淒—憑弔蔣廷黻先生〉，頁193。

的感染。⁽²³⁾

三、從掌故學到「科學的中國近代史」

促使中國近代史研究得以開花結果，第三個基石是民初學術發展中的「科學」傾向。

這裡有必要稍微回顧科學主義在近代中國的發展。「科學」口號自從新文化運動廣泛提倡以來，幾乎已成為中國知識分子共同的信仰。儘管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歐洲曾有過「科學破產」的說法，並且一度甚囂塵上，更因梁啟超《歐遊心影錄》傳播之下，逐漸瀰漫於中國知識界；不過大抵對五四以後的知識青年來說，追求「科學理性」的精神，做為知識訓練上所必備的原則，已經深植人心。⁽²⁴⁾事實上，「崇拜科學」的心態從民國教育方針便可窺知一二。許多高等教育的

⁽²³⁾ Q. Edward Wang, *Inventing China Through History: The May Fourth Approach to Historiograph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1), pp. 132-134. 羅家倫給張維楨另一封信更能看出此一特色。羅在1926年5月22日信上說：「我的野心是要將來公認我於中國這個時代的進步程序中，我是有堅實貢獻，有真正影響，少不了的一個人。不但對於中國學術有種貢獻，而且可以學術影響社會和民族的將來。所以我選定這種近代史的工作。」邵鉛煌，〈羅家倫的浪漫情懷－羅家倫寫給張維楨的情書選粹〉，頁146。

⁽²⁴⁾ 1923年由張君勸（1887-1969）、丁文江（1887-1936）發起的「科學與人生觀」論戰，則是針對科學效能所做的辯論，郭穎頤直言這是「科學主義的勝利」。見：Daniel W. K. Kwok, *Scientism in Chinese Thought, 1900-195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1965), p. 160.

我現在立志不看在中國看得到的書，並〔且〕不看有錢可以買回中國看的書。現在有兩種確定的計畫，為著述的：一種是在歷史哲學方面，對direct中國將來社會思想之趨勢，（一再與西洋學者爭地位）入於適當的正軌；一種是近代中國通史，以科學方法、哲學眼光、文學手段，融合來寫。……近代中國通史是與世界關係分不開的，所以近來專看英、德、法各國有關係之材料，在中國所不能得的。⁽²¹⁾

但不久後給張元濟的書信裡卻顯示，羅家倫則在學思歷程上有了轉變。他向張元濟明確表示，此時已經無意深究歷史哲學，反倒想要完成一部中國近百年通史。根據羅氏的構想，通史計畫是從1820年左右開始，亦即鴉片戰爭的醞釀期，寫至1911年清朝傾覆為止。之所以要把時間的範圍訂定在這一段，羅家倫抱持的理由相當簡單：他以為該時期正是中國歷史變遷最鉅之時，特別是中西文明接觸後，不但政治、社會、經濟制度上互相衝突，而且思想、文化亦莫不如此，值得深究。⁽²²⁾放棄了歷史哲學的探索，選擇了「近代中國通史」研究，當中變化不可不謂甚大。主要理由，羅想徹底掌握中國在近代巨變之下的由來，毋寧仍是導正現今國內思潮想法的延伸。透過羅氏兩封信對中國近百年通史的規劃可知，蔣廷黻口中「做為歐洲帝國主義犧牲品的中國」，無疑讓五四這一代青年有著深切的悲痛，我們很難說羅家倫不無類似

⁽²¹⁾ 邵銘煌，〈羅家倫的浪漫情懷－羅家倫寫給張維楨的情書選粹〉，《近代中國》，第135期（2000年4月），頁132，民國14年5月20日。

⁽²²⁾ 〈致張元濟（菊生）函〉，收在《羅家倫先生文存》，第7冊「函札」，頁49。

學校，紛紛強調以理工相關學科為專長，飽受社會普遍重視，這些在在都說明科學主義的擴張情形，早為不爭事實。同樣的文史研究方面，也受到若干程度的影響。一項最近的研究便指出：就連1930年代史學界，也不得不吹起專業化的作法，講求學歷、資格認證等的審查，無非都是依據「科學化」程度來區別與評覈史家。⁽²⁵⁾

「科學式史學」(scientific history)在西方盛行，不少人都歸功於十九世紀下半葉蘭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特別係他提倡重視事實與考究史料的近代史學。⁽²⁶⁾而無獨有偶，民初史學講求科學化的特色之一，就是要廣泛地佔有特殊、新奇的史料。尤其疑古的趨勢風起雲湧，更使得史學研究中呈現一種「不看二十四史」的現象。⁽²⁷⁾曾經發起「古史辨」運動的顧頡剛(1893-1980)，不僅為古代史研究締造「層累造成」的說法，甚至鼓勵廣泛尋求野史筆記，認為這些資料才能足以真正「說出民衆社會的實話」。⁽²⁸⁾古代史研究容或由於資料亟需克服，這樣遙遠的目標猶能理解，可是對研究中國近代史而言，卻幾乎是項難題。因為近代資料在數量上，既是龐大複雜，難於

⁽²⁵⁾ 劉龍心，〈邁向專業化之途－現代中國史家資格的認證與評覈〉，《新史學》，第13卷第3期（2002年9月），頁79-115。

⁽²⁶⁾ 當然如此的看法也引起質疑和商榷。見：Georg G. Iggers, "The Image of Ranke in American and German Historical Thought," *History and Theory*, 2.1 (1962): 18.

⁽²⁷⁾ 羅志田，〈史料的盡量擴充與不看二十四史－民國新史學的一個詭論現象〉，收在氏著，《近代中國史學十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頁83-125。

⁽²⁸⁾ 顧頡剛，〈中學校本國史教科書編纂法的商榷〉，《教育雜誌》（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1976），第14卷第4號（1922年4月），總頁19662。

控馭，而且往往還包含某些隱諱因素，致使蒐羅上相當困難。這也讓最初的研究均無法突破，產生了前述謝國楨提到《清史稿》史料侷限的問題。因此，掌故之學在民國初年流風熾盛，可以想見。

我們自然要問：為何掌故學會在民初大行其道？恰巧瞿宣穎（1892-1968）有篇談論文章，可以讓我們瞭解問題所在，並釐清民初所謂「掌故」的定義。這篇文章撰於1944年，後來收在徐一士（1886前-？）的《一士談薈》序言，頗有象徵性意義。瞿氏說中國歷史文獻裡，本來已有紀傳、編年、紀事本末及通典等四種體例，然而各有藩籬限制。隨著歷史著作多元的面貌需求所影響，為了補救四種體例不足，不得不有掌故之學。至於對近代掌故學的資源，瞿宣穎指出清代的情況是：

他們多半生當文網嚴密之時，下筆不敢不慎重，所以大致沒有什麼無稽之談；而且他們所處的地位，又是便於考究朝章國故的，所以隸事立言大都能不悖於著作之例，決不是朝野傳聞可比。……有清末葉，文字之禁驟然開放，從前悶著不敢說的一切歷史上疑案，漸都成為好事者之談助。於是談佚聞的，紛然而起。數十年來，私家刊行之專著，以及散見於報章雜識【誌】，一鱗片羽，不胫而走者，不可勝數。人人感覺興趣，成一時風尚，直至最近，還是方興未艾。⁽²⁹⁾

顯示何以民國初年有許多文人，藉著掌故談資而普受歡迎了。以清代史而言，既然官方史書飽受質疑，所以對民間的傳聞，自然重視遠超過以往。類似的看法當不止於瞿宣穎一人而已。譬如當時曾有人將正

⁽²⁹⁾ 兑之，〈掌故學〉，《中國學報》，第1卷第5期（1944年7月），頁3-4。

史和筆記做了對照，謂前者猶似山中恆溪，無法引人入勝，但後者往往把人物之性情描寫畢露，令人耳目一新，宛如天外之飛瀑一般。⁽³⁰⁾由此可見，認定「掌故學值得參考」的心理，是和來自正史材料不足的事實無法分開的。

不過，掌故之學儘管發達，瞿宣穎甚至強調「掌故學者之職務，乃是治史者所不能離手的一部活辭典」，⁽³¹⁾但他也屢稱研治掌故的人，仍然必須根據實事求是的治史方法。基於科學的立場，研究近代中國史還是需要回歸史料基礎之上。民國以後即投入明清史的孟森（1868-1938），對此風氣的感觸尤其深刻。他一系列的文章，如〈奏銷案〉、〈科場案〉、〈董小宛考〉等，都是有意要將清代隱諱的史實揭發出來。就像孟氏《清朝前紀》序中所稱：「易代之後，禁網盡除，吾輩不能繼先民忍死留待之意，爲之臚列發揚，以成信史。徒據清世矯誣捏造之本，做成一代之史，是國民果可欺，而國史真無足輕重？非學人治歷史者之本也。」⁽³²⁾

重視筆記、掌故情形，隨著1930年代大量史料的整理，也逐漸步入退守第二線的命運。這一點，其實與強調「科學」眼光來看待史料有關。近人探索新派史家對舊史料觀反省的問題，指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以下簡稱「史語所」）從李盛鐸（1858-1937）處購得明清內閣大庫檔案經過，便是顯例。⁽³³⁾有關的說明已經很多，這裡無

⁽³⁰⁾ 裴毓馨，〈清代軼聞〉（臺北：華文書局，1969，據1928年鉛印本影印），〈周椒青序〉，頁6-7。

⁽³¹⁾ 兌之，〈掌故學〉，頁3。

⁽³²⁾ 孟森，〈清朝前紀〉（上海：商務印書館，1930），〈序〉，頁1。

⁽³³⁾ 相關討論，見：王汎森，〈什麼可以成為歷史證據—近代中國新舊史料觀

須贅述。我想進一步補充的是，以「科學」眼光來進行史料蒐集，同樣亦發生在近代中國史研究上，相互伴隨而生。

史學「科學」眼光對中國近代史研究產生影響，當中最值得一提是關於史料的出版。除了我們已知史語所整理的「明清檔案」外，蔣廷黻個人的經驗也是一例。據蔣的回憶錄所言，他曾經有過幾次機會，可以透過關係獲得郭嵩燾（1818-1891）、曾國藩（1811-1872）等人的日記和書信，但由於中國人素來對史料有著「古董化」的傾向，結果終都失之交臂。⁽³⁴⁾而相同的心態和情況，也曾帶給蔣廷黻數次幸運。當外界得知蔣氏有意廣蒐清代文獻時，各方鑑定專家和收藏家紛紛向他接頭。據說某次有人帶來私藏的清帝和大臣等外交事務資料抄本，經過蔣廷黻判定後，驚覺「這簡直是一座寶庫」，後來對方索價不菲，幾經曲折之後並沒有購得該批資料。因為時時掛念緣故，蔣氏卻意外地得知故宮尚藏有原本，於是建議當局影印出版。⁽³⁵⁾這一原本無心插柳而付梓的資料，就是日後我們熟知的《籌辦夷務始末》。從蔣廷黻體驗可知，新舊史家對史料觀點殊異，固然間接造成近代史資料不經意流失，可是也禍福互見。有了《籌辦夷務始末》一書經驗，此後二十年間，故宮博物院陸續編輯出版的《掌故叢編》、《史料旬刊》、《文獻叢編》、《清代文字獄檔》及中外關係檔案等五十餘種，⁽³⁶⁾都

點的衝突》，收在氏著，《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3），頁343-376。

⁽³⁴⁾ 蔣廷黻英文口述，謝鍾璉譯，《蔣廷黻回憶錄》，頁128-129。

⁽³⁵⁾ 蔣廷黻英文口述，謝鍾璉譯，《蔣廷黻回憶錄》，頁95-96。

⁽³⁶⁾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館藏檔案概述》（北京：檔案出版社，1985），頁11-13。

可歸於蔣廷黻開啓之功。

然而，能夠以科學精神來看待中國近代史地位的先驅者，卻是羅家倫。他曾在許多場合，不止一次地提到科學對研究的重要。對羅氏而言，科學化簡直就是近代化的象徵。⁽³⁷⁾1926年羅家倫返國後，即應東南大學之邀，擔任歷史系教授，講授「西洋近百年史」與「中國近百年史」。這段期間，羅氏因為積極從事蒐集近代中國史料，有意編寫中國近代史，獲得了昔日北大同學顧頡剛的鼓勵。顧氏曾有「斯人如死，如中國近百年史何」之嘆來形容羅家倫。⁽³⁸⁾我們無論從對史學未來發展還是規劃來看，當時尚在廈門大學任教的顧頡剛，顯然與羅家倫的計畫不謀而合。顧非惟向羅家倫提及「今日實無國民入手一冊之中國歷史書」，⁽³⁹⁾還對羅有意編輯近代史料叢刊工作的理想，表示贊同：

以近代史的複雜與切用，實當許有人從事工作，乃現在青年學子喜治古史，弟每嘆息。推原其故，只因古史方面有弟等鼓吹，而近代史方面，兄等乃不作鼓吹也。竊謂此事鼓吹之責，兄義不容辭，應當以研究方面詔示青年，使毋向二千年前故紙堆中鑽去。⁽⁴⁰⁾

⁽³⁷⁾ 譬如：羅家倫，〈中國近代化問題〉，收在《羅家倫先生文存》，第5冊「演講(上)」，頁384。

⁽³⁸⁾ 〈顧頡剛致羅家倫函〉，1926年12月9日，收在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羅家倫先生文存附編》（臺北：編者印行，1999），頁390。

⁽³⁹⁾ 〈顧頡剛致羅家倫函〉，1927年6月29日，收在《羅家倫先生文存附編》，頁394。

⁽⁴⁰⁾ 〈顧頡剛致羅家倫函〉，1930年7月31日，收在《羅家倫先生文存附編》，

從這封信的內容可知，顧頡剛十分支持羅家倫的構想。如果我們對照日後史語所的成立，顧頡剛與傅斯年（1896-1950）對所中工作計畫意見相左的情形來看，⁽⁴¹⁾顧氏認為「必先培育一批班子，積疊無數資料而加以整理，然後此一二人者方有所憑藉，以一日抵十日之用」，⁽⁴²⁾適足可以瞭解：有關史學的長遠規劃，顧氏無疑對科學治史的立場，反而和羅家倫比較接近。

除了和新派史家具有共通的史學立場和認識外，羅家倫對科學的態度，也充分反映在清華聘請教授的人事問題中。蔣廷黻之所以會到清華歷史系，並兼該系主任，其實也和羅家倫對史學現代化的理念有關。據羅氏日後自承，他為了聘請蔣氏來清華擔任歷史系主任，一度還得罪了他的老師朱希祖（1879-1944），原因是朱氏在系裡的人事資格最老，又說：

若是我讓朱先生擔任系主任的話，那朱先生因為是中國史學的專家，對於世界史學的潮流沒有接觸，自然無法使這個系走到現代化的路上。這是我要請蔣廷黻的理由。⁽⁴³⁾

頁396。

⁽⁴¹⁾ 有關顧、傅兩人理念殊異情形，見：杜正勝，〈無中生有的志業－傅斯年與史語所的創立〉，收在杜正勝、王汎森主編，《新學術之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紀念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8），頁17-22。

⁽⁴²⁾ 顧潮編，《顧頡剛年譜》（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1928年春條，頁152。

⁽⁴³⁾ 羅家倫，〈我和清華大學〉，收在《羅家倫先生文存》，第8冊「日記與

羅家倫認定朱希祖沒有接觸世界史學潮流，其實只是出於個人臆斷，⁽⁴⁴⁾但也反映著他自己在學術研究上的瞭解。顯然對於「世界史學」，羅氏眼光仍放在現代化的範疇籠罩之下。

在蔣廷黻主掌清華歷史系後，也同樣秉持史學現代化理念來經營系務。蔣氏的用人標準，清楚說明對於史學科學化的立場。依蔣回憶，開始時系裡想要找位能夠講授漢代歷史的學者，有人曾推薦能夠通曉各種漢書版本的楊樹達（1884-1956）。可是蔣廷黻的意見卻堅持反對，理由是：

本來，版本鑑定的目的，是要找到一本權威書籍。某一本書之所以能有價值，是因為它能使我們獲悉某一時期、某一階段我們國家的實際情形。但是這個目的反而被人漸漸給忘記了。人們變成研究版本而研究版本、為研究古籍而研究古籍了。此種研究歷史的方法在現在已經落伍，不能再繼續下去。⁽⁴⁵⁾

於此可知蔣氏對史學見解，無意朝版本目錄學的方向發展，而是放置在於釐清歷史社會中的變動和脈絡。這也正是符合當時對新舊史學眼光間差異之處。

回憶・藝文」，頁403。

(44) 早在1920年夏天，當時擔任北京大學史學系的朱氏，便已開始接觸德國史學，並請何炳松翻譯魯賓孫（James H. Robinson, 1863-1936）的《新史學》（*The New History*）一書。見：魯賓孫著，何炳松譯，《新史學》，〈朱希祖序〉，收在劉寅生、房鑫亮編，《何炳松論文集》，第3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頁3-6。此承潘光哲教授提示，謹致謝忱。

(45) 蔣廷黻英文口述，謝鍾璉譯，《蔣廷黻回憶錄》，頁124。

中國近代史經由羅家倫、蔣廷黻等人，堅持要用科學精神來研究近代中國的歷程，並獲得新派史家支持，邁向科學化第一步。羅家倫早在給張元濟的信裡，說到自己的這部中國近百年通史，希望能夠在二十年後完成，目標要成為「中國第一部科學的歷史」、「使中國人從事實裏知道自己所處的是一箇什麼世界」。⁽⁴⁶⁾接著我們應該談談在方法和意義上，他們如何來呈現所謂「科學的中國近代史」。

四、尋求近代史的史學方法

羅家倫、蔣廷黻從海外歸國後，致力中國近代史的研究，毫無疑問為史學界投下一顆巨石。他們的主要貢獻，是為近代中國史尋繹一條適切的研究途徑，並從中提出對中國未來的發展和看法。最重要的是，他們兩人學術的繼承者——郭廷以，將這個理念加以落實，開創中國近代史一處全新的研究領域。

這裡首先需要指出：強調「方法」始終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精神之一。身為新文化運動導師的胡適，自己便終身宣揚方法論的重要，認為它非惟具有客觀的獨立性，甚至可做人生基本的態度。⁽⁴⁷⁾如何為中國近代史建立科學的方法，是羅家倫、蔣廷黻及郭廷以研治近代中國史最迫切的目標。身為五四青年代表，羅家倫數次表達過對「科學」的看法。如羅氏曾說：

⁽⁴⁶⁾ 〈致張元濟（菊生）函〉，頁52。

⁽⁴⁷⁾ 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4），頁49-54。

科學的精神，在於求真、求實、求證，在於不存成見，在於不存區域之見，在於能利用他人的經驗和學理，在於能同時認清國內、國外的現實，在於能分晰【析】而不籠統，在於能在繁複的現象之中求精義，而不為繁複的現象所迷惑。⁽⁴⁸⁾

羅家倫很早就體會研治中國近代史，面臨到方法上的運用。為了避免像掌故家那樣，無法建立客觀的理論基礎，羅家倫意識到資料抉擇和整理，是研究工作裡一項非常重要的環節。如前所述，留學時羅家倫曾致信告訴張元濟，自己有意編寫一部中國近百年通史的計畫。羅氏此信洋洋灑灑，深得張元濟讚賞；尤其關於蒐羅西文裡中國資料的藏書，以及編纂近百年史料叢刊，張氏以為計畫可行，「誠為必不可緩之前提」。⁽⁴⁹⁾我們從羅、張兩人書信往來，可以得知羅家倫此時已經醞釀如何來採用全新的方法，研治中國近代史。而苦思出來的這項方法論，自非一人獨立進行，當然亟需「集衆之力」才能完成。日後等到羅家倫歸國任教，便朝此方向努力前進。

1931年羅家倫發表〈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意義和方法〉，⁽⁵⁰⁾正式揭櫥探求近代中國歷史的原則和方法。在這一篇長文裡，羅氏非但深刻地討論研治近代史的意義，而且還明示了今後研究的相關問題與方向。

⁽⁴⁸⁾ 羅家倫，〈中國近代化問題〉，頁386。

⁽⁴⁹⁾ 〈張元濟致羅家倫函〉，1925年6月27日，收在《羅家倫先生文存附編》，頁222。

⁽⁵⁰⁾ 羅家倫，〈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意義和方法〉，原載《社會科學季刊》（武漢），第2卷第1號（1931年3月），收在《羅家倫先生文存》，第2冊「論著」，頁51-76。

如同另一位五四青年傅斯年的〈歷史語言研究所之工作旨趣〉一樣，⁽⁵¹⁾ 羅的此文有著對近代中國史研究上自許和體認，也具備了里程碑象徵意義的文獻。以下我想先行分析該文內容，然後再說明對蔣廷黻、郭廷以的影響。

羅氏此文，針對學界研究近代史風氣信心不足的心理因素，提出個人看法。他在文章中指稱，近代中國史的研究有三項亟待克服的困難：首先，史學界一直以來都存有歷史古董化的心態；其次，研究近代最艱鉅的難處，勢將面臨資料無法公開的問題；最後則是難以避免個人好惡，無法達到客觀標準。⁽⁵²⁾第一項問題，和學界針對歷史材料態度的轉變一樣，羅家倫也特別強調「平等對待的眼光」。相反地，他認為與古代史比較起來，近代歷史的文獻容易徵集和掌握，倒是一項研究上的優勢。⁽⁵³⁾

在這篇名為〈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意義和方法〉文中，羅家倫並且承認：現在想要動手撰寫一部中國近代史，其實還不到時候。他表示如果有「科學的中國近代史」，則非先倡議編訂中國近代史料叢書不可。羅說：

⁽⁵¹⁾ 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之工作旨趣〉，收在氏著，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第3卷，頁3-12。相關討論見：Wang Fan-Sen, *Fu Ssu-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73-81.

⁽⁵²⁾ 羅家倫，〈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意義和方法〉，頁54。

⁽⁵³⁾ 羅家倫，〈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意義和方法〉，頁57。

史料叢書的編訂，實在是基本的工作，而且是刻不容緩的工作。將所有的史料一齊發表，固不可能，而且不必；但是將其有重要性的下一番「整輯排比」或是「參互搜討」的功夫，實在是新史學的基本建設。

(54)

而透過編訂史料叢書，目的不僅僅在整理近代中國史料，還在展現羅家倫心目中所謂「新史學」，以及如何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方法。羅家倫接著明示：要明瞭近代中國特色，必須懂得掌握中西雙方史料，方可全面獲致史實真相。如謂：「不知道他國材料，或是不能運用他國材料而寫中國近代史，則一定使他的著作，發生一種不可補救的缺陷。」

(55)

若說注意到西方資料，僅是羅家倫對研治中國近代史的心得，那麼他那「集衆之力」來編纂史料的策略，就不能不提到另外兩人——蔣廷黻、郭廷以的努力功不可沒。近代史料豐富異常，自然需要有特別的眼光來採擷。這一點，蔣廷黻其實有著極為深刻的體認。蔣在晚年憶述剛開始涉獵史料的情形是：

研究清代以前中國歷史，學者可已有很多書目提要作參考，但研究清代歷史則不然。當然，我們可以閱讀一些有關的書刊，可是有許多文學作品、私人和小出版商印的五花八門的紀錄，卻不能指給我們方向。

(56)

(54) 羅家倫，〈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意義和方法〉，頁60。

(55) 羅家倫，〈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意義和方法〉，頁66。

(56) 蔣廷黻英文口述，謝鍾璉譯，《蔣廷黻回憶錄》，頁127。

在清華教書時，蔣廷黻有意撰寫一部近代中國外交史，並預計花十年工夫完成。當時蔣氏便已發現，近代中國外交研究一般普遍採用的標準書籍，都是莫斯（H. B. Morse）的外交著作。為了突破資料上侷限，蔣先是編纂了一份外交資料輯要，做為日後研究的準備。我們從蔣氏給羅家倫書信裡得知，資料初稿非惟錄自故宮所藏的軍機處檔案，還曾遠赴至東京東洋文庫，進行蒐集工作。該份資料後來廣在北京學界流傳、出版，儘管蔣廷黻自謙「純為授課之便，殊無學術價值可言」，⁽⁵⁷⁾可是從方法論而言，確實予人耳目一新。如同蔣在序文裡所稱：關懷中國外交始終為他的職志，但是外交史的特殊之處，在於牽連到國際的環境與關係。對近代中國，蔣廷黻以為要先認清外交資料本身的性質，著重其中與本國史料間差異性。譬如他提出在中日甲午戰前，應當要留心中國方面的外交資料；而戰後則需瞭解且研究外國史料。原因是甲午以後，中國的外交幾乎完全喪失了自主權，北京當局的態度往往無關緊要，反倒是應該注意列強各國究竟在政策上，如何進行妥協和牽制，當中可能多有新材料的發現。⁽⁵⁸⁾基於如此的理由，蔣廷黻把這部以外交做為問題導向編纂而成的書，名之為《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難怪郭廷以在閱完此書後，會「覺得有頭緒、有體系」，曾向人詢問作者的姓名，並加以推薦給羅家倫。⁽⁵⁹⁾

⁽⁵⁷⁾ 〈蔣廷黻致羅家倫函〉，1932年9月26日，收在《羅家倫先生文存附編》，頁335。

⁽⁵⁸⁾ 蔣廷黻，〈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上卷自序〉，收在氏著，《蔣廷黻選集》（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8），總頁46。

⁽⁵⁹⁾ 張朋園等，《郭廷以先生訪問記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頁192。

然而事實上，郭廷以自己也長期服膺於羅家倫編纂史料叢書的理念。郭氏所以採取支持態度，一方面固然篤信科學精神，另一方面則來自他個人從事纂輯資料的經驗，深知此一原則對歷史研究影響甚深。本來郭廷以也相當信服「科學」口號，中學時期便對所謂「科學的訓練」學問精神十分嚮往。⁽⁶⁰⁾最先郭廷以接觸到中國近代史研究資料上問題，是在就讀東南大學期間。當時擔任講授「中國近百年史」的柳詒徵，也深感到「材料問題不好解決」。柳氏所採用的授課方式是「拿日本資料來教」，此外還附加選讀《東華錄》。青年學子郭廷以很快察覺出該有一套講求編纂史料的方法。後來他將整理資料的原則，依據章節體格式來劃分，頗受柳氏讚許。⁽⁶¹⁾

至於史料選擇，真正對郭廷以產生過啓蒙的作用，應為羅家倫。根據郭氏晚年回憶，東南大學讀書時，羅家倫帶給他最大的影響有二：一是注意外國資料，另一是研究近代史。郭的說法是：

他認為近百年史的研究，最重要的是研究英國。我在三個月內，寫了十幾萬字的報告「英國在遠東的發展」，利用西方材料說明英國怎樣在印度經營，怎樣利用印度到中國來。當時這報告轟動一時，直到現在基本觀念還沒有改變。而我由於寫這報告，接觸近代史資料，與後來我的研究近代史很有關係。⁽⁶²⁾

這段郭廷以個人深刻的寫作經驗，足以印證他執行羅家倫對中國近代

⁽⁶⁰⁾ 張朋園等，《郭廷以先生訪問記錄》，頁104。

⁽⁶¹⁾ 張朋園等，《郭廷以先生訪問記錄》，頁129。

⁽⁶²⁾ 張朋園等，《郭廷以先生訪問記錄》，頁149。

史研究的一貫理念。首先，研究中國近代問題，不當只求於中國境內材料，而是要藉助非中文的材料加以佐證；第二，史料性質的反映，也進一步凸顯近代中國歷史的特色，必須將它納入到國際世界體系來看；最後，羅家倫最先注意到英國的地位，認為它對中國乃至遠東，產生了不容忽視之影響。

編纂史料叢書的具體實踐，我們還需注意到郭廷以在抗戰期間編的《近代中國史》。這部書共分二冊，上冊起自十六世紀葡萄牙人東航，至十九世紀英國東印度公司對華專利權之廢止，期約三百年；而下冊時限明顯縮短為1834到1846年間，主要範圍係針對中英鴉片戰爭。我們從書末提供的徵引目錄可知：該書非惟強調實錄、外交等史料，還關注到地方志、民間士大夫的筆記史乘，以及西文檔案。郭廷以自言是為了參證《近代中國大事日誌》而編輯，同時也為了將來撰作近代中國通史所做的準備。該書「例言」還說：

編者研習史學，柳翼謀（詒徵）、徐養秋（則陵）兩先生首啓迪之；而專力於近代中國歷史，則實受羅志希先生之教誨，本書之編輯，所得羅先生之指導協助尤多。蔣廷黻先生於近代中國史之科學研究，實與羅先生同開其風氣，直間間接，編者亦受其相當影響。⁽⁶³⁾

表示受到羅、蔣二人影響，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實。不過，《近代中國史》完全把羅家倫〈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意義和方法〉一文做為引論，就不能不說是肯定羅在方法論上的作用了。

⁽⁶³⁾ 郭廷以編，《近代中國史》（上海：上海書店重印本，1992），「例言」，頁2。

除了編訂史料叢書外，羅家倫等人還揭示許多研究近代中國歷史方法，譬如重視工具書之使用。郭廷以對太平天國工具書的編訂，即是顯例。早在1926年秋天，郭在羅氏的指導和訓練下，開始將太平天國史事加以編年。當時的郭廷以尚未大學卒業，便有志藉此做為日後研治近代中國史之工具。首先郭氏就太平天國的曆法加以考訂，以釐清歷史事件的因果關連。他不僅在審閱勘訛過程裡，發現日本學者田中萃一郎（1873-1923）將陰陽曆多算一日，也訂正了另一位研究學者謝興堯（1906-？）若干謬誤。⁽⁶⁴⁾毫無疑問，由於編訂太平天國歷史，正式開啓了郭廷以研治近代中國史的第一步，而羅家倫對郭氏羅列史實的工夫，尤其稱讚。羅氏不僅在日記中私下表示「余心至慰」，深愧自己無法完成，⁽⁶⁵⁾而且還在公開表彰郭氏治史態度時，這麼說：

他治史是很審慎的。他認為要寫太平天國史，必先把太平天國的史實，用比較的方法，考訂其準確性；再按其時間的順序，列舉下來，以時間來統帥綜錯複雜的事實，俾便發現其因果或前置(Antecedent)與後隨(Consequence)的關係——然後可以著筆。結果就成為這一部一千四百餘頁的鉅製：《太平天國史事日誌》。⁽⁶⁶⁾

引文需要注意是羅氏提到治史的方法，說到比較、考訂，又按照時間

⁽⁶⁴⁾ 郭廷以，《太平天國曆法考訂》（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3），〈序〉，頁1-2。

⁽⁶⁵⁾ 羅久芳註記，邵銘煌校讀，〈羅家倫日記－民國36年至39年〉，《近代中國》，第131期（1999年6月），頁149，民國36年1月5日條。

⁽⁶⁶⁾ 郭廷以，《太平天國史事日誌》（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3），〈羅家倫序〉，頁2。

排列史實順序，以求發現其中前因後果。這些工具書對研究專題的重要，固為今日史家之共識，但與其說羅家倫是強調工具書功用，毋寧謂他認為編纂工具書「方法」的追求，實為研究者所必須的條件。羅並說郭氏此書最寶貴之處，尚有列表和附地圖方式，其中地圖的展示，更出自近代研究的觀念，拜技術發展所賜。⁽⁶⁷⁾總之，《太平天國史事日誌》的出版，無疑帶來專家進行研究上的便利，貢獻不可不謂深鉅。難怪直到1990年代，依然有人表示：該書迄今仍為研究者案頭必備的工具書。⁽⁶⁸⁾編纂史料叢書、工具書以方便認清史事，同時藉以尋求脈絡系統，始終是羅家倫、郭廷以等人認為研治近代中國史的必備法門。直到晚年，郭氏孜孜不倦地完成《近代中國史事日誌》，不啻為個人理念的展現，⁽⁶⁹⁾而他一手創立的近代史研究所，仍以此為努力目標。

另一項方法是關於理論和資料的結合。蔣廷黻執教南開期間，為了瞭解中國社會內部及經濟實況，於是讓學生對學校附近進行調查。類似這樣的教學課程，幾乎是當時出國留學學生回來任教後，所面臨到的教學難題。因為從國外習得的社會科學理論，似乎缺乏足可印證的實例。即如蕭公權（1897-1981）講授中國政治思想史，許多資料也都必須傳鈔自舊籍。⁽⁷⁰⁾而蔣廷黻的教學方法，非僅開啓口述歷史契機，並且進而觸動經濟學家何廉（1895-1975）及其同僚，樹立了研究的典

⁽⁶⁷⁾ 郭廷以，《太平天國史事日誌》，〈羅家倫序〉，頁2。

⁽⁶⁸⁾ 羅爾綱，《太平天國史》（北京：中華書局，1991），〈（劉大年）序一〉，頁2。

⁽⁶⁹⁾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事日誌》（臺北：郭廷以自刊本，1963），「編者說明」，頁1。

⁽⁷⁰⁾ 蕭公權，《問學諫往錄》（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2），頁101-102。

範，於1926、7兩年間進行中國社會經濟調查工作。⁽⁷¹⁾同時何氏的教學「中國化」，使得經濟學科和中國實際材料能相互配合，恐怕多少與此有關。何、蔣兩人在教學理念上相契，何氏個人還曾出資數千元購買中國史書，力促蔣氏改攻中國近代外交史。⁽⁷²⁾這段緣由不得不說是兩人對中國社會調查工作上，有著共識為基礎之故了。

最末也是最為重要的，羅家倫認為史學若要具備成為一項科學訓練，尚須強調專門分題的研究。他用了「摩洛拉格夫」（monograph）一詞，說科學的史學必須只能純粹探求單一或專門的主題。一旦這些單獨的課題獲得釐清，那麼研究更大的問題才會可靠，而不致圖托空想。羅氏一再說明，惟有史料叢書纂輯和「摩洛拉格夫」工作完成，才能著手去撰寫「科學的中國近代史」。⁽⁷³⁾可能是羅家倫唯一真正的史學專著《中山先生倫敦蒙難史料考訂》，毫無疑問正是兩者結合下展現出來的作品。它在1930年代前後著手出版，即使在書中，羅氏仍不忘呼籲：「若是中國要有科學化歷史和傳記，非趕快分別專題，從搜集、審定、研究資料著手」。⁽⁷⁴⁾

⁽⁷¹⁾ 蔣廷黻英文口述，謝鍾璉譯，《蔣廷黻回憶錄》，頁97-98；何廉英文口述，朱佑慈等譯，《何廉回憶錄》（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8），頁55-65。

⁽⁷²⁾ 張朋園等，《郭廷以先生訪問記錄》，頁192。

⁽⁷³⁾ 羅家倫，〈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意義和方法〉，頁74-76。

⁽⁷⁴⁾ 羅家倫，《中山先生倫敦蒙難史料考訂》，〈序〉，收在《羅家倫先生文存》，第3冊「譯著」，頁3。

五、《中國通史》稿本中所呈現的近代中國史觀

最後，本文要進一步藉由郭廷以《中國通史》稿本內容，說明其中反映的近代中國史觀。

現存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的《中國通史》稿本，原來並未署名。根據內容推斷，應是郭廷以預備為中學生所寫的教科書，⁽⁷⁵⁾而撰作完成的時間，約在抗戰結束之後。稿本係以毛筆法書，其中內容有多處經塗抹修改，總分為五大巨冊，共有十五編。書後並附有大事簡表。

稿本中首先需要注意的特點，是篇幅方面比例不均。雖然郭廷以編寫的時代範圍，橫亘古今上下（區分為「上古」、「中古」、「近世」、「近代」），可是我們若以清康熙元年（1662）到抗戰結束（1945）為例，在短短不到三百年的時間，篇幅竟達五分之三，顯見分配上頗有詳今略古的傾向。或許可以如此推測：這部《中國通史》稿本有關近代的討論，正是郭廷以晚年完成《近代中國史綱》之前，最初一部對中國近代歷史研究總結性的著作。

既然這部稿本的份量，主要集中在近世、近代兩個時段，那麼我們還需進而瞭解：為何郭廷以要花費絕大心力來描述近代。這不得不

⁽⁷⁵⁾ 譬如稿本「例言」第八點宣稱：「書中引錄之文，不一一註其出處，以求簡明」，其後附言：「中學生亦無須知道此許多書名。」第九點：「編通史不易，編教科書式之通史尤難」，可知設定的讀者群。均見：「郭廷以先生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以下簡稱「郭檔」），編號69-04-002-001-000-001。

讓我們先知道郭氏所繼承的人——羅家倫對「近代」的地位和定義。羅氏曾在多處嘗試對「近代」的輪廓略做釐清，企圖在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裡，建立具有「科學」意義之處。羅不止一次說明：研究歷史的目的，在於解決當前人類活動之問題，而「近百年來獨特之近代史，吾人所以研究此者，蓋以與吾人最親切，最有關係，且其變化興替，以時間言之，多居最近，誠如吾人之眼見者。」⁽⁷⁶⁾對羅家倫來說，近代史的研究本身，有著現實濟世的關懷；身為中國近代之人，更具體說，要具備「近代化」國民的資格，更須研究中國近代史。如羅氏在〈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意義和方法〉一文便重申：

要知人類或民族過去的來歷和演進、現在的地位和環境，以及他將來的生存和發展，都非研究他近代的歷史不可。這不是說遠的古的不要研究，或是研究了也不重要，乃是說近的切的更當研究，尤為重要。所以做近代的人，必須研究近代史；做中國近代的人，更須研究中國近代史。⁽⁷⁷⁾

羅家倫還說明中國近代史的特色，是中國加入國際世界。他抱持的理由是：「中國確是和西洋一天一天的增加了許多國際關係，發生了許多深刻的影響」，「現在沒有幾件中國的事實，是可以離開世界的環境講得通的」。⁽⁷⁸⁾1930年初期，當南京國民政府積極謀訂平等的外交

⁽⁷⁶⁾ 羅家倫，〈對於中國近代史應有的認識〉，原載《新晨報·學匯》，1929年1月16日，現收在《羅家倫先生文存》，第5冊「演講(上)」，頁37。

⁽⁷⁷⁾ 羅家倫，〈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意義和方法〉，頁51。

⁽⁷⁸⁾ 羅家倫，〈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意義和方法〉，頁52-53。

政策時，現實的意義自然也反映在歷史書寫方面。所以在羅家倫心目中，研治中國近代史的目的，其實是為了因應實際環境的需要，同時也符合知識上的要求。

羅家倫對中國近代史意義的賦予，後來分別為蔣廷黻、郭廷以所承襲。1945年顧頡剛回顧近代中國史的編寫時，曾以時間將近代中國史分期，略分為二派：一是從發現新航路的世界交通變化為由，自明末到民國建立為止，以鄭鶴聲（1901-？）為代表；另一則把近代史歸於鴉片戰爭後中西發生新的關係算起，以蔣廷黻、郭廷以為代表。⁽⁷⁹⁾可以看出，以鴉片戰爭做劃分傳統和近代分水嶺，蔣、郭二人明顯是以羅家倫「中國進入國際世界」看法為依據。

值得一提是，有關近代史的性質，恰巧也成為日後1950年代美國學界費正清（John K. Fairbank）討論近代中國「衝擊與反應」（impact and response）的基調。1930年代初期，跟費正清一同在北京生活的畢乃德（Knight Biggerstaff, 1906-），有過如此回憶：

當時生活在北京，正逢一個具有刺激性的年代。十分重要的是，經過現代教育培養的中國學者，正大批地、迅速地成長，如胡適、蔣廷黻、洪煨蓮、丁文江等，他們對那些認真的外國學者極有幫助。⁽⁸⁰⁾

可以想見學術交流對史學圈所造成的影响。年輕的費正清正處在兩種

⁽⁷⁹⁾ 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香港：龍門書店校訂本，1964），頁83-85。

⁽⁸⁰⁾ Paul A. Cohen and Merle Goldman ed., *Fairbank Remembered* (Cambridge, Mass.: John K. Fairbank Center for East Asian Researc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9.

文化差異之間，積極想要釐清中西雙方關係，顯然也帶給了他對中國外交與國際視野上的識見。「衝擊與反應」始於湯恩比（Arnold J. Toynbee, 1889-1975）對世界文明的詮釋，如今此一觀點早已備受質疑。⁽⁸¹⁾儘管我們不能過份認為費正清的觀點，係沿襲了蔣廷黻的看法，但是卻無法忽視他和鄧嗣禹選編近代中國歷史文獻時，甚至關於現代化（modernization）的看法上，可能也受到了相當的啓示。⁽⁸²⁾

其次關於中國近代外交的描述，郭廷以在稿本中顯然承襲了羅家倫、蔣廷黻的觀點，著重中外接觸的探討。早在處理外交關係上，蔣廷黻對中國近代史的研究，提出許多突破傳統觀念的見解。如此改變當然受益於資料的運用。像蔣廷黻和郭廷以兩人在編纂資料時，便深刻感受到中西雙方不同史料所構築起來的立場，自然會有所偏執，進而袒護某方；相反地，我們要想更能釐清其中的史實真相，就必須環顧所有可能存在的差異及意見。蔣廷黻說：「以前研究中國外交史者雖不乏其人，但是他們的著作，不分中外，幾全以外國發表的文件為根據。專憑片面證據來撰外交史，好像專聽一面的辯詞來判訟，那是不能得其公平的。」⁽⁸³⁾對蔣氏而言，直接史料固然重要，可是除了考

⁽⁸¹⁾ 有關此一方面討論，最重要的著作厥為：Paul A.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⁸²⁾ John King Fairbank, *Chinabound: A Fifty-year Memoir*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2), pp. 85-90; Paul M. Evans, *John Fairbank and the American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China* (New York,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8), pp. 166-172.

⁽⁸³⁾ 蔣廷黻，〈「清季外交史料」序〉，《蔣廷黻選集》，總頁439。

究資料方法外，還需瞭解「旁觀者」的意見，因為「旁觀者」能夠帶給我們「一種新見解與鼓勵」。⁽⁸⁴⁾如此的看法，郭廷以爲姚薇元所寫的《鴉片戰爭史事考》序言裡，也有類似的觀點。郭氏明白指出：中國近代史一方面既要善用外國材料，而且又要明瞭他們偏執之立場，以避免在運用材料新趨勢裡，產生「過重洋貨，輕視國產」的危機。⁽⁸⁵⁾

因爲對中西資料問題的釐清，蔣廷黻將參與鴉片戰爭兩位人物——林則徐（1785-1850）、琦善（約1790-1854）——相互比較，提過不同的評價及爭議。以往傳統中國方面的資料，比較同情林氏，而多對琦善斥責詆毀；可是蔣廷黻卻認爲其中涉及種族的偏見。蔣指出清末中國在邁向條約體制的過程中，無論滿漢各族，曾經參與訂立外交條約人士，絕非向來既定的負面印象。在蔣氏〈琦善與鴉片戰爭〉一文中，他大膽聲稱：琦善能夠審察時勢與權衡得失，實際遠超乎時人識見之上，甚至連林則徐都有所未及。⁽⁸⁶⁾這一想法，後來還在蔣氏那本《中國近代史大綱》裡繼續發揮。⁽⁸⁷⁾非僅如此，蔣甘冒時人之譏，翻案去批判我們熟知的林則徐。他指稱：「林則徐實在有兩個，一個

⁽⁸⁴⁾ 陶恩培(Arnold J. Toynbee)著，李頤譯，〈中國革新運動與日本土耳其革新運動的異同〉，《國聞週報》，第4卷第41期（1927年10月23日），蔣廷黻「前記」，頁1。

⁽⁸⁵⁾ 姚薇元，《鴉片戰爭史事考》（臺北：古亭書屋，1971），〈郭序〉，頁5。

⁽⁸⁶⁾ 蔣廷黻，〈琦善與鴉片戰爭〉，原載《清華學報》，收在《蔣廷黻選集》，總頁73。

⁽⁸⁷⁾ 這部書完成於1938年5、6月間空暇，那時蔣廷黻剛自蘇俄歸國，以少許圖書資料在身邊的情況下編寫而成。見：蔣廷黻，《中國近代史大綱》（臺北：啓明書店，1959），〈小序〉。

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林則徐，一個是真正的林則徐。」真正的林則徐因為深感中國軍器不如西洋，故竭力購買外國船砲。在蔣廷黻看來，如此一位普遍被視為英雄的歷史人物，實有著複雜且矛盾之心理，又不敢公開去提倡。反倒是主張「撫夷」的琦善、耆英（1790-1858），卻遭到諸多詰難，始終在歷史上承受惡名。⁽⁸⁸⁾蔣的結論出現時機，正處於民族主義革命高潮之際，他也呼籲中國近代外交的錯誤，不可全然偏袒，把過錯推諉於外國列強一方。這樣的說法因此引發爭論，曾經一度獲致各方輿論批評。⁽⁸⁹⁾

而郭廷以稿本對鴉片戰爭的討論，則是把它放置在國際的關係上來看。他指出「中英衝突並非純為鴉片問題，英人尤作如是觀，但是鴉片問題確為決裂的近因，中國更認為這是主要的爭點。這次的戰爭，是中西的短兵相接，是中國大變局的起點，百年的悲運危機從此開始。」⁽⁹⁰⁾自外交的觀點來看，郭廷以把南京條約的簽訂視如政治性的條約，而非處理商務問題，其中關鍵原因在於中國始終缺乏主權觀念。⁽⁹¹⁾很遺憾是清廷對此仍昧於查明情勢，無法及時應對，結果造成中西關係轉變，不平等條約接踵而至。兩次的英法聯軍，更進一步迫使整個中國港口不得不予開放，最終係「中國完全加入國際社會」。⁽⁹²⁾

郭著《中國通史》近代部分另一項深值觀察的重點，是關於太平天國的研究與評價。前面提過，郭氏曾經長期投注在太平天國史事的

⁽⁸⁸⁾ 蔣廷黻，《中國近代史大綱》，頁32-34。

⁽⁸⁹⁾ 蔣廷黻英文口述，謝鍾璣譯，《蔣廷黻回憶錄》，頁129。

⁽⁹⁰⁾ 「郭檔」，編號69-04-002-004-097。

⁽⁹¹⁾ 「郭檔」，編號69-04-002-004-101。

⁽⁹²⁾ 「郭檔」，編號69-04-002-004-108。

考訂上。本來羅家倫、蔣廷黻進行中國近代史研究，就十分重視曾國藩、李鴻章（1823-1901）等人的事功，其中原因可以歸結和太平天國有極密切的關係。更確切說，太平軍起事以滿漢問題為口號，這在民國以後是項極富爭議的課題，深具傳說及神話色彩。羅家倫為郭廷以所撰的《太平天國史事日誌》序言便嘆：

滿清覆亡以後，「長毛」的傳說中加入了許多浪漫的革命情緒。太平天國乃從民間祖母嚇孫兒啼哭的故事，成為志士文人茶餘酒後的談資。然而太平天國始終是神秘的、浪漫的。從客觀的史實，以嚴整的史學方法，來研究這一代成敗興亡的，究有幾人？⁽⁹³⁾

此段話可知中國近代史事在普遍民衆心理的印象和變化。太平軍原來只是具備傳統民俗神話的色彩，到了革命成功建立民國後，故事性質卻逐漸轉為平日閒聊的話題，始終與客觀地史學研究無關。

然而1930年代太平天國的研究方興未艾，以各種立場來進行解讀的專家，如蕭一山（1902-1978）、簡又文（1896-1978）、羅爾綱（1901-1997）等，均不乏其人。⁽⁹⁴⁾據傳，錢穆在《國史大綱》也有類似問題的討論，他的立場是站在曾、李等人民族大義上，而逕稱「洪楊之亂」。《國史大綱》後來出版審查時，一度就因為該項理由而頗

⁽⁹³⁾ 郭廷以，《太平天國史事日誌》，〈羅家倫序〉，頁1。

⁽⁹⁴⁾ 相關討論可見：呂寶強，〈郭廷以先生對於太平天國的研究與貢獻〉，收在陳三井編，《郭廷以先生九秩誕辰紀念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下冊，頁12-14。

受阻撓。⁽⁹⁵⁾反觀郭廷以的《中國通史》稿本，基本上綜合了現有的學術研究成果，將洪秀全起事因素歸於人口成長、滿漢問題及西力衝擊上。對太平天國的評價，郭氏在稿本的討論顯得四平八穩，並沒有給予一項特定的地位；至於洪秀全失敗的原因，則謂「他有一套不中不西的理論，但不適合當時的需要；近代的知識他固然缺乏，舊有的文化他一樣無知。」⁽⁹⁶⁾郭廷以綜舉太平天國失敗致命傷有五：政治的污亂、戰略的錯誤、宗教的自愚、統治的殘酷，以及知識的貧乏。⁽⁹⁷⁾特別需要注意的是最末一項，「知識」是郭廷以認為建設現代國家唯一的條件，也符合他所謂近代化歷史的構想。

最後我們還需指出：對中國的未來，郭廷以明顯地以羅家倫的「國民革命」史觀，做為全書的基本論調。儘管早年秉持學術獨立的原則，羅家倫指稱要寫一部科學的歷史，非有「三不主義」——不理論化、不道德化、不國家化——不可。⁽⁹⁸⁾可是長期以來，羅家倫加入中國國民黨行列，便以「國民革命」觀點來詮釋對中國近代史的認識。依照羅在擔任清華大學校長期間發言，認為中國近代史如果自鴉片戰爭算起，歷經英法聯軍、甲午戰爭、八國聯軍等國際性戰役；國內革命則有太平天國、辛亥革命，這些引發而來各式各樣改革，「雖曰屈服，然尚有刷新之思。」而如今只有國民革命做為號召，努力準備未來。⁽⁹⁹⁾

⁽⁹⁵⁾ 錢穆，《國史大綱》（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2，修訂第十八次印刷），頁666-671；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頁206。

⁽⁹⁶⁾ 「郭檔」，編號69-04-002-004-114。

⁽⁹⁷⁾ 「郭檔」，編號69-04-002-004-124。

⁽⁹⁸⁾ 〈致張元濟（菊生）函〉，頁50。

⁽⁹⁹⁾ 〈對於中國近代史應有的認識〉，《羅家倫先生文存》，第5冊「演講（上）」，

近代中國史以國民革命史觀為論述，在今日來說頗有「黨化教育」之譏，可是對1940年代而言，毋寧象徵和呼應國民政府在訓政時期的一種歷史詮釋。應當注意，在郭廷以眼中，國民革命最終根本目的，是「為建設一個近代化的新中國。」⁽¹⁰⁰⁾要完成這項使命，近代中國演進的過程，自然被描述成類似朝向直線性的進化發展。在稿本第十四編「國民革命的成就」中，我們幾乎可以完全嗅到如此革命史觀論述的出現。郭廷以提示國民革命之目的，正是為了響應民初最重要的思想革命——五四新文化運動而來，其中的主要內容在於「革心」，並且要掃除所有不利於革命建國使命的障礙：軍閥和帝國主義。⁽¹⁰¹⁾而代表這一股改革的中心力量，主要係來自秉持同盟會以降理念下的中國國民黨。這套史觀論述之所以呈現，《中國通史》稿本裡並不諱言是受到羅家倫〈五四的真精神〉所啟發。⁽¹⁰²⁾

《中國通史》稿本最後的篇幅，止於抗戰勝利及臺灣光復兩項主題。對日抗戰的勝利，其實象徵著中國正逐步擺脫帝國主義的侵略。因為中國在1942年先後與英、美各國廢除不平等條約，獲得「光榮的勝利」。整體來說，郭廷以在稿本的敘事，並不脫於羅家倫的「近代化」和「國民革命」兩種史觀的架構。日後羅家倫對於中國現代國民革命史觀的討論，自然隨著國民政府遷臺後、而羅氏主掌黨史會主任委員時更趨完備。等到1949年大陸易幟變色，受到「政治正確」所領

⁽¹⁰⁰⁾ 「郭檔」，編號69-04-002-005-122。

⁽¹⁰¹⁾ 「郭檔」，編號69-04-002-005-113。

⁽¹⁰²⁾ 「郭檔」，編號69-04-002-005-103。

導，羅家倫無怪乎成為大陸馬列史學雲罩下千夫所指的矛頭。⁽¹⁰³⁾至於國民革命史觀為近代中國史的歷史解釋，便逐漸失去了政治傳播空間，退守僅限於臺灣一地。

六、結 語

以上討論，將中國近代史研究在1930年代以來最初的發展進程，做一勾勒，主要指出羅家倫、蔣廷黻對研究方法、史學觀點的建立，以及郭廷以受到影響後的實踐及理論化。這些思想和行動的交涉，對日後建立中國近代史觀，具有相當的意義和影響。如何從近代歷史發展來解釋現階段中國情勢，到1950年代以後，更形成美國史學界一股重要的潮流。無論在資料的蒐集、研究方法的實踐、理論架構的建立，本文分析的蔣廷黻、羅家倫和郭廷以等人，無疑具有承先啟後的地位。不管是郭氏幾部史事日誌、考訂等書，還是從近代化理論來詮釋中國近代史，都遵循當初羅家倫撰寫一部「科學的中國近代史」為理念。

結束本文前應該還要強調兩點：第一，「科學的中國近代史」雖然在羅家倫等人揭示之下，逐漸成為中國史學研究一支，但是距離現代大規模而有體系的學術研究，尚須等到郭廷以開創近代史研究所以後才算完成。第二，「國民革命」史觀，代表著1940年代訓政時期結束的歷史解釋，並非是謹守而全然不容置換的信條。即使對郭廷以本

⁽¹⁰³⁾ 例如稱羅家倫以「捧蔣反共」為爭取表現。見：陳中凡，〈我所知道的羅家倫〉，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90輯（1983年6月），頁137。

人而言，亦做如是觀，我們從他後來對門生張朋園《梁啟超與清季革命》一書的反應可以推知。⁽¹⁰⁴⁾ 相同地，晚年郭氏《近代中國史綱》對中國近代史的詮釋，也未必與稿本裡的意見一致。而且以實證主義式「科學」來研治史學，如今似也飽受許多質疑和挑戰。⁽¹⁰⁵⁾ 不過，思想既然是時代和社會交錯影響下的產物，《中國通史》稿本內容反映了它階段性歷史的使命。當我們今日再回顧史學前輩所做的努力時，不應忽略他們對史學的貢獻。

⁽¹⁰⁴⁾ 張朋園，〈回想量字師〉，收在陳三井編，《走過憂患的歲月－近史所的故事》（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頁96。

⁽¹⁰⁵⁾ Georg G. Iggers, *Historiogra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From Scientific Objectivity to the Postmodern Challenge* (Hanover and London: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97); 對於史學如何以「科學」的方法及意義呈現，另可詳參：Richard J. Evans, *In Defense of History* (New York: W.W. Norton, 1999), pp. 39–63.

Chiang Ten-fu, Luo Jia-lun, Kuo Ting-yee: the Making of ‘Scientific Modern Chinese History’ and Interpretations

Chih-hong Lin

Abstract

This theme regards studying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MCH) as the centre, it is analysed how this field is in historical discipline set up, what kind of characteristic and then develop into. The main focus concentrate on Chiang Ten-fu, Luo Jia-lun and Kuo Ting-yee, show their influence on MCH. The article lays particular emphasis on three parts: First, how MCH becomes independent research field, including the background and condition of the times. Second part discusses the methods and meanings of studying MCH, is mainly with the opinions that three people are correlated with to Chiang, Luo and Kuo in 1930s. Finally, from the manuscript of *Chinese general history* which made by Kuo, it is as an example analyse the contents about MCH area among them, and try to examine the MCH opinions reflected in the manuscript and interpretations.

Keywords: Chiang Ten-fu, Luo Jia-lun, Kuo Ting-yee, modern Chinese history